

# 从知识精英到纳粹分子

——德国魏玛时期的大学生研究

王莹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立项课题——  
“德国社会转型时期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学术超员’问题研究”  
(课题批准号: EOA120420) 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2年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魏玛时期德国大学生就业与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最终研究成果

# 从知识精英到纳粹分子

——德国魏玛时期的大学生研究

王莹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知识精英到纳粹分子:德国魏玛时期的大学生研究/王莹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307-13379-2

I. 从… II. 王… III. 法西斯主义—影响—大学生—研究—德国—1918~1933 IV. ①G641 ②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7278 号



责任编辑:李程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佳

---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4 字数: 198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3379-2 定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自序

魏玛共和国(1918—1933)是德国社会向民主制转型的时期,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德国“世界科学之王”的地位却在逐步衰落,最终,包括广大大学生在内的日耳曼知识分子向纳粹“一边倒”。众所周知,大学生本应是未来文化的生力军,新兴力量的代表,可是他们为何没有像英、法等国大学生那样成为自由民主的拥护者,反而误入歧途,成为纳粹的拥趸呢?

事实上,在19—20世纪的德国历史中,大学生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远远超越了其“知识分子后备军”的身份。在德国学术界,学者们一直都在关注大学生这一群体,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大学生运动的浪潮下,史学家们才开始真正关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大学生,此时,如何维护民主制度稳定的问题重新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有人甚至认为,早在1933年之前,大学生就成功颠覆了一个民主国家,因为这个民主制国家既没有对大学生进行成功的民主政治教育,也没有防微杜渐,及早控制大学生的右倾动向,更没有使用有效手段抵抗大学生倒向纳粹。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探讨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生的社会困境、教育问题、就业危机和思想波动,从而追究他们最终投入纳粹的原因。行文按照魏玛共和国政治开端、发展、结局的历史进程,先对19世纪至“一战”前德意志大学生运动的发展做一回顾,然后对魏玛时期“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和“倒向纳粹的一代”大学生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从经济原因上分析,大学生特别容易受到纳粹的影响,最初是因为魏玛时代严峻的“知识行业”过剩问题。虽然1918年

后，随着政治发展，大学校门越来越向下层民众开放，但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却很成问题，知识分子就业市场越来越萎缩，无法消化高校增长的学生人数。1924—1929年，知识分子失业率仍居高不下，“知识无产者”成为一个流行语，知识分子在莫名其妙地“贬值”。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导致了更严重的秩序混乱，德国高等教育阶层曾经期望的地位朝不保夕。在这种环境下，知识职位遥遥无期的等待和日益缩水的收入对他们产生了苛刻的压力，这些压力引起了大学生们的愤慨，他们将其发泄在这个跛脚的民主制共和国身上。

其次，德国高等教育的弊端在魏玛时期逐渐恶化。此时，中产阶级无法再通过传统的方式，将“教育”与“财产”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财富部分或全部遭受损失，传统知识精英赖以生存的教育根基土崩瓦解。如果将20世纪20年代的大学科研看作“资产阶级”教育长期畸形发展的副作用，那么魏玛共和国的大学生对于这个后果则是无法回避的。从本质上讲，接受教育就是一种资本投资的形式。其中包含了储蓄、投资和利润的最终收益。像任何投资者一样，受教育的德国人期望他们在学习上的资本投入能够带来合理的回报和保护。当倾囊投入但却零回报时，他们就会诉诸政治。在1918—1933年的德国，受教育者并没有安全感，教育财富受到的威胁正如其他私有财产的神圣性遭到侵犯一样。在既定的观念中，一个有学问的人在道德上也是具有优越性的，但“无产者化”似乎是高级思维和内在价值的一种失败——换言之，传统的学术价值遭到毁灭，成为堕落的物质主义的牺牲品，“真正的智力生活”消失了。

最后，在魏玛共和国之初，大学生就有一种思想危机。从威廉时代继承而来的思想基础与现实生存状况之间的碰撞，使他们的精英意识被迫改变，这也成为他们碎片化的原因。战后初期，新老大学生成了同窗好友，前线战士一代在心理上的成熟和经历上的丰富使他们的精神和政治导向更加理性，在1918年至1923年的大学生的思想波动中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但到了20年代中期，随着前线大学生离开校园，大学生右倾激进主义失去了约束力量。他们

的集体不安全感使他们与纳粹主义开始亲密起来，他们终于找到填补社会与精神真空的材料。30年代初，在经济大萧条的打击下，固有的政治矛盾更加无法调和。随着希特勒夺权，大学生感到他们的苦难将要终结，因为一个新的、具有行动力的总理将是德意志民族未来的保证，将由他们来完成社会革新任务。这意味着大学生能够像以前一样生活在精英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

从短时段历史而言，魏玛共和国为大学生政治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社会环境，他们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天空中叱咤风云，练就了娴熟的政治技能，也使纳粹找到了打开大学生政治大门的钥匙。大学生社团是社会首屈一指的政治力量，正是依靠了他们，纳粹党才最终走向政治霸权。

从长时段历史而言，魏玛时期的德国大学生走向纳粹的原因则深埋于德意志漫长的历史之中，正是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特殊性使得德意志民族主义在纳粹时代终于首先在年轻人身上像火山一样喷发了。但是，不能断言，大学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做好走向纳粹的准备。造成这种结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其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变量。

王莹

2014年1月

# 目 录

导 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6
三、篇章结构	22
四、译名说明	24
第一章 德意志大学生问题历史回顾(19世纪初—1918)	27
第一节 德意志大学生社团组织的发展	27
第二节 结社生活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塑造	36
第三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前线青年”	43
本章小结	48
第二章 “前线青年的一代”(1919—1923)	50
第一节 “前线青年的一代”与大学生的政治态度	50
一、“前线青年的一代”与新生共和国	51
二、“前线青年的一代”参政思想动机	54
三、“前线青年的一代”与代际关系	57
四、大学生社团内部的政治教育	61
第二节 “前线青年的一代”生存困境与“知识行业超员”	65
一、经济困境	66
二、“知识行业超员”	71
三、公共救助与自力更生	75
第三节 “前线青年的一代”精英观与军事参与	81

一、捍卫知识精英的特权思想 .....	81
二、保卫国家的军事行动 .....	85
本章小结 .....	89
<b>第三章 “相对稳定的一代”(1924—1929)</b> .....	91
第一节 社会变革与“相对稳定的一代”生存状况 .....	91
一、“相对稳定的一代”经济状况 .....	92
二、“相对稳定的一代”就业前景 .....	94
三、“相对稳定的一代”与美国主义 .....	96
四、“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前途恐慌症 .....	99
第二节 “相对稳定的一代”结构变化与传统社团的衰落 ...	103
一、高校发展与大学生结构变化 .....	104
二、传统大学生社团的衰落 .....	109
第三节 “相对稳定的一代”的政治态度 .....	112
一、“前线战士神话”的复活 .....	113
二、“相对稳定的一代”政治右转 .....	116
三、“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反犹倾向 .....	120
本章小结 .....	124
<b>第四章 “倒向纳粹的一代”(1929—1933)</b> .....	125
第一节 就业危机与“倒向纳粹的一代”前途绝望 .....	125
一、“知识行业超员”的白热化 .....	126
二、“倒向纳粹的一代”对自身前途的绝望 .....	131
第二节 “倒向纳粹的一代”与反犹浪潮的爆发 .....	134
一、限制犹太大学生人数的理由 .....	134
二、“倒向纳粹的一代”反犹活动高涨 .....	140
第三节 “倒向纳粹的一代”与“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崛起 ...	143
一、“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发展 .....	144
二、“纳粹大学生联盟”的结构分析 .....	151
三、“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国防体育运动” .....	158



---

本章小结.....	163
结语.....	165
附录.....	170
译名对照表.....	170
图表.....	172
参考文献.....	194
后记.....	212

# 导 论

## 一、研究缘起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早已是尽人皆知，但鲜被提及的还有另一次大屠杀——书籍大屠杀，即 1933 年 5 月 10 日柏林的“焚书运动”。在这次焚书中，两万多册犹太作家、进步学者的智慧结晶在大学生们病魔般的欢呼中被扔进熊熊烈火之中。海涅曾说：“哪里有人在烧书，哪里最后就烧人。”从目的和性质上讲，这次的焚书事件与历史上数次的焚书大同小异。但是，从参加对象和意义上而言，它却具有特殊的内涵。因为，这次焚书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在校大学生。他们既是知识的化身，又是未来文化的生力军。何以会受到纳粹主义的蛊惑，陷入集体的疯癫？在时间的坐标轴上，他们刚刚亲身经历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尝试——魏玛共和国，何以在它刚刚失败之际就如此兴高采烈地为其大唱挽歌？要解释这些，远则要追究深埋于德国漫长历史之中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殊性，近则要考察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发展的轨迹，尤其是大学生们的成长历程，那种从 19 世纪末便开始在德国人身上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到了纳粹时代终于首先在年轻人身上像火山一样喷发了。

若要解释这一过程，则必须研究近代以来德国大学生的发展轨迹。德国历史学界在涉及这一问题的相关领域早有建树。例如，德国学术界对青年运动史的研究由来已久，但问题在于，“青年”（Jugend）与“大学生”（Student）并非同义词，而早期的青年运动史或者社团史学是以某个社团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不能全面地反映大学生的特征。再例如，德国的高校发展可以追溯至中世纪，而且高校史研究在德国史学界是优势领域。但高校史往往关注的是高等教

育的哲学理念、高校发展过程、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等，大学生在其中充当的是配角，史学家是以他们为晴雨表来反映高校发展的成败得失。至于大学生的所感所想并不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同样，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学者们的着眼点往往是那些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教育改革家、教授、科学家等。但作为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的大学生则成为失语者，淹没在学术话语的汪洋大海之中。从德语中对“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用词上就能反映这点。“Intellektuelle”一般意义上指以脑力劳动为职业的人，不包括大学生，而“Akademiker”才指一般大学生。

然而，长期以来，在德国史学界，专门以大学生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大学生史却处于某种从属地位，例如，与上述的青年运动史、社团史、高校史、知识分子史、科技史、教育史，甚至政治经济史等错综复杂地交杂在一起，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分支，更谈不上某个历史流派。虽然间或有历史学家振臂高呼一下，但也难以引起学界重视，很快成为过眼烟云。

当然，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料所限。大学生及其社团的出版物、档案要么年久失传，要么因为战争散失殆尽，要么七零八碎地分散在各个高校和机构中，不集中不统一，而 20 世纪上半叶变幻莫测的德国政局使政府也无暇顾及学术发展，这也成为大学生史研究的实际困难。所以，大学生史一直是德国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局势的逐渐稳定，为科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条件。但此时，科学研究的兴趣还是集中在政治、经济、独裁等问题的探讨上。有关魏玛共和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大学生研究更处于边缘状态。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这种状况才出现转变的契机，在世界风起云涌的大学生运动浪潮下，西德的大学生运动重新激发了人们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生的政治态度的兴趣。此时，关于如何维护民主制度稳定的问题重新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与民主或独裁制度的关系成为焦点。有人甚至认为，早在 1933 年之前，大学生就成功颠覆了一个民主国家，因为这个民

主制国家既没有对大学生进行成功的民主政治教育，也没有防微杜渐，及早控制大学生的右倾动向，更没有使用有效手段防止大学生导向纳粹。<sup>①</sup>虽然这种观点表达了某种偏见，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作为社会的批评力量，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观点也间接地指责了自由国家的懦弱。德意志第一个民主政体十分缺乏民主主义者，它不仅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而且是一个建立在旧帝国体制上的傀儡。年轻的一代毫无诚意地“屈就”于民主政体。为了使他们认识到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德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它需要第三帝国带来的灾难使大学生觉醒，使他们认识到，建立在自由宪法基础上的独立大学教育和自由科学研究的可贵。因此，魏玛时期塑造了大学生人格和政治倾向的大学体制、教育改革、学术研究都需要细致考察，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日常生活、人生前景和政治态度有必要重新定义、评价。大学生的历史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德国史学研究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何大学生史应该且有必要成为史学家情有独钟的领域呢？首先，大学生是一个在法律意义上、文化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相对单一的群体。其次，学生时代也是青年人人生中一段比较固定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当中，他们耳濡目染了对其日后影响深远的大学生群体意识，而且他们的人员成分和生活较单纯，与其他社会阶层瓜葛少，较少被家庭琐事纠缠。再次，在德国独特的科学体制和研究型学科体制下，德国大学生形成了高度的独立性以及自由的思维方式，不墨守成规。这种特点增强了他们在职业上、社会上以及经济上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此外，大学生还未完全进入社会，因此也具有强烈的不妥协性。所以，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理念倾向于严肃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大学生视自身为精英，而且在公众眼中，他们也是当之无愧的精英。一方面，这种自我高估对于获得“优越的社会地位”是“绝对必要的自我认知”。但是也因此产生了

---

<sup>①</sup> Wolfgang Zorn, *Student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5, No. 1, *Generations in Conflict*, 1970, p. 143.

“社会变革的地震效应”<sup>①</sup>；另一方面，大学生社团也引领了德国政治文化的走向，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并与种种社会政治力量和组织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还在于，处于这个人生阶段的年轻人往往是靠感性来判断世界的。与其他的党派、社会团体不同的是，他们的凝聚力不是来自于共同的经济或者社会利益，而是来自于理想的感召和对正义公平的追求，所以大学生的志同道合具有很强的精神层面的意义。他们与社会暂时处于脱节的状态，因此政治理想和理念都显得崇高而严肃，缺乏妥协精神。魏玛时期的大学生不是反抗上一代的压迫与统治，不是反对父权制，而是向往“美好的旧时光”，希望回到其祖父辈的俾斯麦时代。他们通过政治诉求来表达反抗，这也是大学生首次将参与政治作为斗争手段，将反抗作为他们一种表达不满的权力，并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大学生史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 90 年代东西德国的分裂局面结束之后，德国国家档案馆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档案文献。但是，相比起德国史学研究的传统领域而言，大学生史仍是新生儿。史学家们也处在摸索阶段。这个时期，研究魏玛时代大学生作品的突出缺点是：结论往往是先验性的，并且论据不充分。例如，将魏玛时代看作第三帝国的序幕，将大学生倒向纳粹视为宿命，还围绕着纳粹上台与对青年人的控制问题而展开，而没有将魏玛时期看作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历史时期。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档案的逐步解密开放，大学生史的研究步入了新阶段。德国的史学工作者开始从宏观走向微观，因为此时他们已经能够掌握某个社团详尽的史料，或者掌握某个地域、高校的大学生在魏玛时期的具体活动。所以，微观研究作品层出不穷，而且在原始材料上挖掘深刻。但存在的问题是，缺乏从宏观领域、多角度对魏玛时期的大学生的总体把握，而且，某一社团与高校的状况是否能够成为魏玛时代大学生的突出代表呢？这个问题尚待史

---

<sup>①</sup>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d. 1,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C. H. Beck, München, 1990, S. 581.

学家作答。因此，魏玛时期的大学生史研究尚存足够的拓展空间。

另外，随着史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历史学也开始借鉴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史、艺术史、新闻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求更客观地反映历史原貌。其中，政治文化史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兴趣的热点，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软因素——如文化背景、心态、政治模式——如今越来越被描绘为导致社会变革的硬因素。因为无论战争还是和平，无论社会动荡还是经济波动，局势的走向都与人们感知、认识和解释事件的方式与方法息息相关。因此，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研究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大学生，从而进一步反映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整体风貌，已经成为德国史学研究的前沿地带之一。例如，如何从“政治美学”、“文化符号”等这些现代观念解释大学生的政治动向，而不是先验性地给他们戴上右翼分子储备力量的帽子。因此，学者们倘若仅仅从社团活动入手来研究大学生，这样就显得单薄而没有说服力，所以，还需要先从社会功能上阐述大学生的作用和意义，然后与魏玛时期的政治文化相结合，以此来反映整个时代精神。

而且，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而言是具有研究上的可操作性的。虽然细化研究是一种趋势，但这样也难免会导致窥一斑难见全豹的错误。而且，作为一个国外的学者，若想详尽掌握某一团体、地区或者高校的档案材料、清楚辨认并准确理解也有一定难度。但可以从广泛收集的各社团、各地区或者各高校的材料中总结出魏玛时期大学生的总体趋向。

本书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突出魏玛共和国的时代特征，将其看作一段独特的历史时期，而不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延续或者“第三帝国”的前身。同样，本书也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大学生看作一个具有自身鲜明文化特征和政治态度的整体，突出历史进程中“人”的因素，尤其是这些长期没有历史话语权的“小人物”，他们的所感所想，他们的心理状态，以求从他们身上来反映整个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治文化特色。

最后，本书试图与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现实联系在一起。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到来也伴随着一些问题和忧虑。当

精英教育的模式被打破，具有滞后性的社会制度是否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迎接它呢？从古代的“学而优则仕”到如今的大学生就业难、蚁族等社会问题，中国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本书希望通过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生的研究，深入了解大学生的心理思想行为模式，来类比当今中国存在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为我国文化领域的建设和新青年的培养提供参考。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对魏玛共和国时期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的研究，长期主导着对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方向，取得了丰富和深入的成果。但是局限于传统经济史和政治史难免会犯历史研究的偏食错误。如前文所述，魏玛共和国时代大学生史的研究就是一个值得学者潜心钻研的领域。

魏玛时代大学生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世界大学生运动的浪潮下，史学家们试图分析魏玛共和国的大学生倒向纳粹的原因，找出治理青年社会危机和拯救民主制度的良方。但由于当时绝大部分大学生社团的档案还未解密，所以大多数研究是以大学生整体为研究对象的，总体而言缺乏专门研究某个大学生社团的作品。

1961 年，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尼培代 (Thomas Nipperdey) 以其敏锐的历史嗅觉，首先撰写了研究魏玛共和国初期大学生发展状况的文章《魏玛共和国初期德意志大学生》。<sup>①</sup>该文研究了魏玛时代高校政治中的重要事件，如持续到 1927 年所谓的“普鲁士宪法之争”。但是，此时，尼培代运用的研究方法乃是“旧史新说”，在新史料尚不丰富的情况下，利用以前的旧史料提出新的

---

<sup>①</sup> Thomas Nipperdey,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den ersten Jah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Adolf Grimme (Hg.), *Kulturverwaltung der zwanziger Jahre. Alte Dokumente und neue Beiträge*, W. Kohlhammer, Stuttgart, 1961, S. 19-48.

史学见解。三年后，阿道夫·赖森(Adolf Leisen)的博士论文讨论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大学生的政治作用，但他使用的原始资料也较为单薄。<sup>①</sup>1965年，沃尔夫冈·左恩(Wolfgang Zorn)首次从社会历史层面对魏玛时期大学生的政治发展进行了透视。<sup>②</sup>1967年，记者出身的汉斯-彼得·布吕尔(Hans Peter Bleuel)和恩斯特·克里讷特(Ernst Klinnert)合作撰写的《德国大学生走向第三帝国之路》研究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生的心理、社会活动和变化，揭示了他们投入纳粹怀抱的动机。<sup>③</sup>但缺点是“按图索骥”，将大学生走向纳粹看作历史发展的必然。另外，他们写作得比较匆忙，略显粗糙，过于侧重具体事件的描述，缺乏对这条“道路”细致而具有说服力的分析。

迫于资料限制，史学家无法从档案入手对大学生展开深入研究，这成为阻碍大学生史研究向前发展的最大难题。就在这时，对大学生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机构——高校学研究中心(Institut für Hochschulkunde)——在维尔茨堡成立了。该中心是当时唯一保存了20世纪20—30年代丰富的大学生社团原始档案的机构。

在它的基础上，1969年，世界上首篇从一手档案出发研究“纳粹大学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简称NSDStB)的博士论文在美国诞生了——《纳粹大学生联盟史》。<sup>④</sup>这篇论文使用了详尽的原始材料、写作非常严密，但缺点是选取的时

---

<sup>①</sup> Adolf Leisen, *Die Ausbreitung des völkischen Gedankens in der Studentenschaft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ss. Phil., Heidelberg, 1964.

<sup>②</sup> Wolfgang Zorn,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Studententums 1918-1931*, In: Kurt Stephenson u. a. (Hg.), *Darstellungen u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inheitsbewegung im neunzehnten und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Bd. 5, Heidelberg, 1965, S. 223-307.

<sup>③</sup> Hans Peter Bleuel & Ernst Klinnert, *Deutsche Studenten auf 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1918-1935. Ideologien-Programme-Aktionen*, Siegbert Mohn Verlag, Gütersloh, 1967.

<sup>④</sup> Ursula Ruth Brockert Dübner,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Student League*, Diss. Phil.,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9.



间段是1926—1945年，而不是严格按照“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兴起和衰落来断代的。但这篇论文的出现为大学生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即将研究的基础建立在丰富的原始史料上。

在这种新方向的指引下，很快，魏玛时期大学生研究有了新进展。1970年，沃尔夫冈·左恩(Wolfgang Zorn)发表了《魏玛共和国的大学生政治》一文，<sup>①</sup>简要叙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生的政治发展过程和与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运动的关联。但作为一篇篇幅不长的论文，文章涉及的史料有限。1971年，尤尔根·施瓦茨(Jürgen Schwarz)出版了专著《魏玛共和国的大学生：1918—1923年的德国大学生及其政治态度》，<sup>②</sup>首次从总体角度概览了魏玛初期大学生及其面临的问题。使用的原始材料可谓广博，并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社会学及心理学领域。但这本专著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涉及的时段过短，只研究了1918—1923年的情况，但这段时间，正值魏玛共和国的中产阶级经济地位逐步恢复稳定的时期。因此，这部专著没有解答魏玛共和国的大学生的宿命问题：大学生的生存危机与孤注一掷地倒向纳粹之间的关联。同年，美国学者米歇尔·S.施坦贝格(Michael S. Steinberg)的博士论文《军刀、书籍与褐衫：德国大学生的激进化1918—1935》研究了从魏玛共和国成立到纳粹一体化运动时德国大学生的政治倾向、社团活动及一体化运动，还描写了时人的所感所想。但缺点在于过于注重叙事，忽略了分析。<sup>③</sup>

此时，一些敏锐的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大学生研究需要细化的问题，大学生思想较活跃，需要用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他们。但在社团

<sup>①</sup> Wolfgang Zorn, *Student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5, No. 1, *Generations in Conflict*(1970), pp. 128-143.

<sup>②</sup> Jürgen Schwarz, *Studen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der Zeit von 1918 bis 1923 und ihre Stellung zur Politik*,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1971.

<sup>③</sup> Michael S. Steinberg, *Sabres, Books and Brown Shirts. The Radicalization of the German Student 1918-1935*, Diss. Phil.,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1.